

川东北红色资源类别梳理 及其源流追溯

——兼论红色文化价值提升途径

李万斌 陈 岗 何志明

【摘 要】 红色文化属于革命历史文化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川东北地区现存有丰厚的红色文化资源,成为拉动本地区经济增长的潜在财富。该地区的红色文化资源从物质到非物质层面,可谓类别众多。川东北的红色文化资源也与四川人民长期以来不畏强暴、反抗压迫的群体性格特征密切相连。在新形势下应自觉主动加大对川东北地区的红色文化资源的保护与开发力度,以更好地适应老区的发展,进而实现红色文化的价值增值。

【关键词】 川东北;红色文化;类别梳理;价值提升

【中图分类号】 G127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8-0139(2012)04-0138-7

党的十七届六中全会指出,“当代中国进入了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关键时期和深化改革开放、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攻坚时期,文化越来越成为民族凝聚力和创造力的重要源泉、越来越成为综合国力竞争的重要因素、越来越成为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支撑,丰富精神文化生活越来越成为我国人民的热切愿望。”^{〔1〕}在新时期,加强文化传承创新,提升文化价值就成为摆在我们面前的重要课题。在广阔的文化领域内,红色文化一直以其独特的时代性、实践性、地域性及思想性特征引人注目。它是在中国共产党人及其领导下的无产阶级革命运动中经过多次实践形成的物质与精神财富的总和,是中国文化体系中独特部分,更是中华民族不畏艰险、敢于抗争的精神体现。

红色文化折射出一个时代与地域的历史沧桑,

也承载于红色资源基础之上。若无众多的红色资源支撑,红色文化也就无所依存。这些资源可能是物质形态存在,也可以为非物质状态出现。四川特别是川东北地区,既为全国最早的共产主义组织诞生之地,也为全国第二大苏区——川陕苏区的所在地,更是众多将帅伟人故里的集聚区。同时,该地区留下的红色歌谣、诗词、故事等也十分丰硕。但在四川内部,红色资源的分布存在明显的地域差异,川东北

红色资源的富集程度很高,本文将主要研究地域重心置于川东北地区。鉴于以往研究成果,本文主要基于以下问题来展开:川东北现存的红色资源可以分为那些类别?四川之所以存在如此多的红色资源,其源头到底在何处?与四川人民的群体性格有何关系?对现存的红色文化资源,如何对其实现价值增值?应该采取哪些措施来实现红色资源的保护

为了展现红色文化在四川地区的源远流长及保证时空一致性,在本文中,四川的范围涵盖了今重庆市,川东北则主要为四川达州、巴中、广元、广安、南充及今重庆市等地。

〔作者简介〕李万斌,四川文理学院教授;
陈 岗,四川文理学院教授;
何志明,四川文理学院教授,四川 达州 635000。

与开发?为此,本文拟对以上问题进行探讨,并以此文,纪念红军入川80周年。

一、川东北现存红色文化资源类别梳理及其文化特征

红色文化资源是指中国人民在马克思主义理论指导及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在理论与实践过程中所遗留的、以精神与物质形态存在的一种特殊文化形态。众所周知,四川保存着丰富的红色文化资源,它们是属于四川人民宝贵的精神与物质财富。由于历史原因,这些文化资源在分布地域上呈现了大分散、小积聚的现象,川东北即为红色文化资源相对集中的地区。红色文化资源就其存在形态观之,存在着物质与非物质两种基本形态。但若以具体类别而言,现存的红色文化资源则可以梳理为以下几类:

一是石刻文献类。川东北红色文化资源中一个富有自身特色的部分就是镌刻在悬崖峭壁与道行路旁石头上的红色标语与政策法规。这些标语内容极为丰富,涉及苏区政治、经济、文化乃至社会生活等流域。其中有标语之王——“赤化全川”,也有《中国共产党十大政纲》,还有《中华苏维埃第一次代表大会劳动法(草案)》等,这些石刻文献是四川红色文化中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研究苏区历史的重要参考资料。它们在四川尤其是川东北现存数量众多,据统计,川陕地带的石刻标语达2000余条。^[2]万源发现最长红军石刻标语,标语字径0.2米,字数累计长34.8米,标语正文134字,落款12字,加上21个标点符号,全文167字。这些石刻文献属于川东北乃至国内当之无愧的红色文化瑰宝。

二是器皿器物类。川陕苏区为全国第二大苏区,该地红色文化资源遗留与保护下来的极为丰富,有人称之为“红军文物露天博物馆”。^[3]仅巴中市内被博物馆收藏的红军文物就达10619件,其中一级文物13件,二级文物132件,三级文物2826件。除此之外,红军使用过的武器、货币、衣物、邮票、用具等更是属于红色资源中的重要部分,目前这些文物被有关部门征集的数量达到3000余件。^[4]其中当年苏

区使用的一种独特钱币——布币,更是十分珍贵的红色文物,是研究苏区财政经济状况的重要依据。

三是纸质文献类。川陕革命根据地在条件极为艰苦的情况下坚持了两年有余,与中央苏区相比时间相对较为短暂,因此留下来的红色纸质文献类较为稀少,正因如此方显其珍贵。据四川省博物院主编的《西行壮歌——川陕革命根据地斗争史》一书中披露,现藏于该单位的红色文献相对较集中,如有川陕省委宣传部印发的《中国共产党十大政纲》、川陕省委机关报《川北穷人》、《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宪法大纲》、《川陕省苏维埃组织法》等一批红色报刊。^[5]这些纸质文献与石刻文献共同构成了研究苏区历史的宝贵资料,更是宣传红色文化的一种重要媒介。

四是遗址遗迹类。红色遗迹遗址众多也是川东北地区的一个特色。由于根据地经常遭到来自敌对力量的挑战,双方战事不断,以此留下了为数颇丰的红色遗址。这些遗址大部分仍然保存完好。红军当年仅在广元境内就留下了67处重大战役遗址。除此之外,红色政权遗址也是一个组成部分,广元老区就存有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中共川陕省委等各级苏维埃政权遗址1724处。^[6]而在达州市,更有红三十军政治部遗址、红九军军部遗址、红四方面军总指挥徐向前前线指挥部遗址等,据统计,该市现存的革命遗址即达118处。^[7]

五是纪念馆类。川东北地区现建立了众多的红色主题纪念馆,其中有名人故居、故里,如邓小平、朱德、刘伯承、张爱萍、王维舟等著名领导人的故居纪念馆(地处达州的有张爱萍故居等),更有战史陈列馆、军事作战指挥部纪念馆等,如万源保卫战战史陈列馆,巴中市通江县的红四方面军总指挥部旧址纪念馆,巴中市的川陕苏区博物馆等。从文化人类学的角度来讲,建构红色堂馆这种特别的公共空间,是一种以历史的记录与诠释来塑造民族记忆的方式,它将更有利于民众对红色文化与精神的传承与发扬。

六是故事歌谣类。流传在川东北的非物质文化

川东北分布着为数可观的红色资源,如纪念馆、遗址遗迹等,据不完全统计,仅达州一地即有国家级爱国主义教育基地遗址1处(万源保卫战战史陈列馆),省级3处,县市级36处,革命遗址更是达128处。见中共达州市委党史办编:《达州爱国主义教育基地革命遗址简介》,内部编印,2009年。

资源如红军故事、传说等是川东北红色文化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如目前发现的红军戏剧、歌曲等文艺作品达到40余首。^[8]除此之外,川陕苏区还流传着众多故事,如有“红色标语王”之称的刘瑞龙(国务委员刘延东之父,他主持了川陕苏区大多数石刻标语的镌刻)为川陕苏区经济建设所作出的宣传贡献等。

^[9]但在缺乏文字记录的情况下,这些故事歌谣类的红色文化不断在流失乃至消亡,亟待有关部门进行抢救性保护。

由以上分类可知,川东北红色文化资源内容丰富,种类繁多,彰显了自身的文化价值。红色文化资源遍及全国,川东北乃至四川的红色资源特色何在?从文化学的角度来讲,要充分把握住文化类型的特征,必须分析其所具有的文化特征。川东北红色文化是该地区新时代先进文化的结晶,在中国幅员辽阔的地域内部,红色文化分布于大江南北,当年中国共产党人创建的众多革命根据地内部至今还保存着大量的红色文化资源,如江西原中央苏区、鄂豫皖苏区乃至川陕苏区等,它们除了在总体特征趋于一致外,也因其各自的自然条件、人文风俗等生成背景而富有特色。总体而言,川东北红色文化体现了时代性、思想性、实践性、地域性以及生动性等特征。

时代性特征是指红色文化是革命年代的产物,具有特殊的历史背景。红色文化的载体,如红色(石刻)文献如《中华全国苏维埃第一次代表大会劳动法令(草案)》,著名石刻对联“斧头劈开新世界,镰刀割断旧乾坤”等,都展现了解放劳苦大众、反抗压迫的思想内涵,这是红色文化思想性的基本体现。红色文化是红军留在四川的重要精神财富,反映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乃至川东北地区实践的产物,具有鲜明的实践性。川东北现存大量的石刻文献,川陕苏区位于四川东北部,系秦岭大巴山脉南麓,群山蜿蜒千里,在悬崖峭壁上分布着大量的坚硬岩石,当年川陕苏区政府为了宣传自己的政纲,在岩石上镌刻了大量政纲、标语等,如四川省通江县红云崖峭壁之上的标语之王——“赤化全川”,更是其中的代表作品,这些都体现了红色文化的地域性特征。红色文化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具体实践的产物,反映了广大劳动民众的心声,这注定了其与生俱来的朴实无华及贴近生活的基本特质,如为了宣传自己的政

治主张,当年川陕苏区政府镌刻的大量标语,如“工农专政”等,这些标语浅显易懂,具有“契合常人的文化知识水平、易于识记、能创设力量氛围以及凝聚人心”的特点,^[10]使红色文化被赋予了一种“活的灵魂”,即生动性。

二、性格记忆:四川红色文化的源流回溯

在整部中国近代史中,四川都扮演着极为重要的角色。从保路运动独领风骚,到作为抗战大后方的突出贡献;从戊戌六君子中的杨锐、刘光第,到新中国十大元帅中的朱德、刘伯承、陈毅和聂荣臻,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邓小平和国家主席杨尚昆……,诸如此类的例子不胜枚举。近代四川可谓名人辈出,成为与湖南相比肩的重要省份。这些以挽救国家危亡为天降大任的历史人物,则是四川人民勇于抗争、不屈不挠的群体性格的最好体现。群体性格是可以传承与延续的,而这种传承与延续就是一种性格记忆。红色文化则与这种记忆有着直接的联系。对此,本文试着对四川的红色文化进行源流追溯。

每一个民族的文化,都有其各具特色的传统,没有自己的传统,文化就不能延续和发展。四川红色文化的积淀,与四川人民与生俱来的群体性格有着密切的关系。四川古称“巴蜀”,而川东北则属于古巴国范围,历来即有“巴出将,蜀出相”的说法。巴人的祖先为生活在川东北的一支远古族群——“賁人”(又称巴人),以勇武好战著称,据史料记载,賁人在武王伐纣、灭秦兴汉乃至楚汉之争中都扮演了极其重要的角色。^[11]《华阳国志》评价巴人为“民质直好义,士风敦厚”,而且“人多劲勇,少文学,有将帅才”。^[12]即巴人的性格特点为重义轻利,具有质朴刚毅、不怕流血流汗的性格特征(川东北乡村至今流传着一种体现巴人剽悍勇武的舞蹈——巴渝舞)。川东北人民的这种顽强不屈的性格特征在后来抵御蒙古南下攻伐的过程中有着生动地体现。为抵御蒙古铁骑南下攻川,川东北不少州县建立了军事要塞,这些防御工事形成了互为犄角之势的“抗蒙十八柱”,使得蒙古骑兵在合川钓鱼城受阻达36年之久。公元1259年,被欧洲人称为“上帝之鞭”的蒙古大汗蒙哥在钓鱼城遭到南宋守军炮火重创,不久辞世。随后,原率军西征欧洲的诸王公为争夺汗位,纷纷停

止西进转而返回草原祖庭,使原本岌岌可危的被攻方得以喘息。钓鱼城也因此被欧洲人称为“上帝折鞭处”。可见,敢于抗争、不畏强敌是川东北人群体的秉赋及性格特质。在中国近代史上,这种刚毅民风的传承对川东北乃至四川的影响极为深远。

1919年,巴黎和会上中国外交失败的消息传回国内后,引发了著名的五四爱国运动。当时在北京与上海等地,反抗强权、维护尊严的学生、工人运动更是此起彼伏。四川尽管地处西部内陆,交通信息较为闭塞,但仍然发起了浪潮汹涌的抗争运动。如在地处川东北的达县,当时就读于达县中学(今四川文理学院前身)的革命活动家戴治安、张爱萍等,迅速走上街头,带领青年学生投入到了挽救中华民族危亡的行列。^[13]张爱萍等人还在达县中学发起组织“烂漫社”,宣传社会主义并在达县建立了共青团组织。^[14]

“五四”后,国内涌现了众多研究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社团,而在此基础上一些地方的党小组也陆续成立。为了整合国内的共产党小组,在共产国际的帮助之下,1921年7月各地党小组派遣代表前往上海,举行“一大”,并通过党纲,正式成立全国性的组织——中国共产党。但在四川,共产党主义组织成立的时间甚至要早于中共“一大”召开。早在1920年,著名革命家吴玉章等人联合一些青年组织了“青年共产党”,该组织成员后来加入了中国共产党。^[15]根据近年来公布的档案,1920年3月12日在四川重庆成立的共产主义组织,则为目前发现在国内最早成立的党组织。这个组织当时还向共产国际递交了一份《四川省重庆共产主义组织的报告》,它遂成为研究这个组织的第一手文献。根据《报告》的内容可以发现,该组织具有“成立时间早、规模庞大、人数众多、组织机构健全、组织程序严密、经费充裕、开展工作及其计划庞大的特点”,如该组织在四川共有成都、叙府、雅州、顺庆和重庆五个组织,总部设于重庆,并设立“书记处、宣传部、财务部、出版部”四个机构,拥有正式和候补成员近100名,同时还制定了严格的加入程序,如要求有两个成员介绍,经过五或六个月的候补期,经大会决议通过

后发给党证方能成为正式成员。^[16]因此无论从成员数量、组织严密性等方面来讲,这个四川重庆共产主义组织都在当时是最为完善的。当然,这个组织后来的发展如何,目前档案文献尚未发现有关记载,但它在当时的领先地位已经充分展示了马克思主义在四川的传播状况。随着马克思主义的传播,川东北诞生了如戴治安、王维舟等一大批仁人志士,他们积极建立各类研究团体,如王维舟在宣汉创办宏文小学“开始进行共产主义小组活动”,^[17]为在川东北宣传马克思主义做出了自己的贡献。

1921年中国共产党成立后,开始在全国积极发展组织。1923年,应共产国际的要求,中国共产党在“三大”上决定与国民党实行党内合作,共产党员以个人名义加入国民党。由此开始了从1924年国共一次合作至1927年“七·一五事变”间的合作历程。在这期间,在国民党政府控制下的区域,共产党组织公开或半公开地发展成员,力量发展迅速。但在四川地区,该地党组织的生存艰难程度远大于广东等地,因为从四川党组织建立起,就一直处于地下状态,党组织也多次遭到破坏,党员人数变化起伏很大。

1927年3月31日,四川军阀刘湘在重庆发动“三·三一”事变,使四川省委遭到严重破坏,省委负责人杨闇公也被捕牺牲,这使四川地下党面临的局势更加严峻,不少共产党员更是遭受残酷追杀、省委机关屡遭破坏。在这种极端不利的情况下,四川党组织坚持以不屈不挠的毅力发展成员,扩大规模,并组织了多次罢工、兵变。如为了迎接红军入川,四川地下党组织更是进行了众多的活动,如中共四川省委还发起为红军购买“四川工农号”飞机的募捐活动。^[18]从中共四川党组织的发展历史可知,尽管四川党遭到了多次破坏,但仍然以坚忍不拔的毅力在川内积极发展组织。

1937年抗战的全面爆发,使四川站到了肩负抗战重任的时代前沿。在中华民族危机存亡的紧急关头,国共两党捐弃前嫌,再次携手合作。尽管国民党对于中共四川党组织仍然施行打压的方针,但四川党组织仍以大局为重,努力发动民众积极支持抗战,领导各

如四川省委在1927年就遭到了三次严重破坏。特别是在9月和10月连续两次被破坏使“文件几乎全部损失,委员仅余三分之一”。详见《四川临时省委通告——整顿纪律严密组织事》(1927年8月12日),中央档案馆等编:《四川革命历史文件汇集》(1926-1927),甲2,1989年,第49-50页。

种救亡团体努力宣传抗战到底,如组织星芒社、群力社、川大抗敌宣传团、大声社、天明歌咏团等,川东北地方团体有阆中青抗宣传团以及南充文化救亡团等。这些工作“都是立在抗战方面帮助政府,向人民解释政府抗战的好处与困难”,^[19]以努力增强中国人民的抗战力量。

在八年抗战期间,四川为抗战胜利所作出的伟大贡献则绝不应抹杀。抗战后期,四川成为大后方物质、人力供应基地。如据统计,抗战八年来,四川实征壮丁人数为各省之首,达到2578810名。^[20]在抗战后期发起的知识青年参军运动中,更是以四川为主,而地处川东北的达县(原川陕苏区范围,今属达州市),则有163名知识青年参军,并且他们是“全国到达陪都的第一批”,时任达县县长的周开庆后来评价道:“这是达县对于抗战的光荣贡献”。^[21]在八年抗战艰难取胜后,1945年10月8日,中共中央南方局所属的重庆《新华日报》刊发了一篇《感谢四川人民》的著名社论,社论指出“自武汉失守以后,四川成了正面战场的政治军事财政经济的中心,随着正面战线内移的军民同胞,大半居于斯、食于斯、发财亦于斯。现在抗战结束了,我们想到四川人民,真不能不由衷地表示感激。”^[22]这篇社论,实际上对四川人民为坚持抗战、挽救中华民族危难做出的巨大贡献给予了高度评价。

从以上的追溯可知,从远古的巴师伐纣、到近代保路运动的发起乃至抗日救亡的开展,从川东北诞生最早的共产主义组织到顽强生存的中共四川地下党,都折射了一个川东北人民所具备的坚忍不拔、不屈不挠的群体性格。而这是这种性格记忆,成为四川红色文化积淀的内在因素。在新形势下,如何使四川尤其是川东北现有的丰富红色文化资源价值得到进一步提升,如它的教育功能、记忆功能乃至社会管理创新功能等,都是值得当代学人思考的问题。并且,随着时间的推移,四川不少红色文化资源在逐渐流失,乃至湮没,亟待得到全社会的关注。

三、科学实施:川东北红色文化资源价值的提升途径

红色文化资源是属于川东北人民的宝贵财富,是时代精神生存发展之源头和基础,其生命力更在

于时代意义与精神财富。但种种客观原因,该地区的红色文化资源的价值尚未得到有效提升,较之江西苏区而言,川东北地区的红色文化挖掘,如在教育下一代、拉动地方经济增长及创新社会管理等方面都与“全国第二大苏区”的地位明显不符。在中央吹响向文化大发展大繁荣进军的号角后,川东北地区深入开发该地的红色文化资源,提升其自身价值的紧迫性刻不容缓。笔者以为,目前应采取以下的措施实现红色资源的价值增值:

一是建立红色文化资源的名录档案制度。开发的前提是保护。针对红色文化资源的保护与价值提升,有学者认为应该加快构建“红色文化遗产保护体系”,即将革命文物、文献、纪念性建筑等“红色文化遗存”强化保护,并参照文化遗产地的保护办法,对红色文化进行“局部的原风貌保护”。^[23]笔者以为这种保护固属恰当,但目前红色文化资源由于不少轶散各地,且有的尚在无形中流失,政府相关职能部门苦于不能确切地掌握目前本地尚存的红色资源确切名单,甚至对有些本属红色文化的宝贵资源之重要性尚未能取得共识,以致出现保护缺位的现象。保护红色文化资源的关键在于迅速建立起本地红色文化资源的名录档案制度,使政府与社会各界对该地现存的红色文化有一个统一的认识。有案可稽,举措始有方。

二是抓紧时机进行口述史料搜集。红色文化与红军有着极为密切的关系,而当年从事革命斗争的幸存老红军是历史的亲历与见证人。他们以自己的亲身经历来解说那段革命斗争史,可以“再现过去”,避免对历史进行线性化描述的缺陷。针对口述史料,西方学者指出“真实的过去包含着许许多多的经历,其中一部分是重要的、关键的、值得记住的、明确的”,而这也使其“经历变得色彩缤纷,饶有趣味”。^[24]由于红军本身的传奇色彩,使得其故事在原川陕苏区内部广为流传。如1951年中央访问团(原通南巴先遣工作组)在其中第三次工作报告中写道,这里的人们“常能滔滔不绝地很生动地讲述当年老红军革命故事”。^[25]但随着时间的推移,当年幸存的老红军不断去世,使得搜集口述史料的紧迫性大大加强。口述史的搜集可不仅限于红军本人,其家人亦可成为访谈的对象。因为在日常生活

中,家人实际上已经扮演了访谈者或者聆听者的角色。而口述史料的搜集,在人力和经费方面则需要高校与政府乃至企事业单位展开密切合作。

三是鼓励社会各方积极参与红色资源保护。通过建立博物馆的方式对红色文化资源进行保护,目前已经证明是一种比较好的方式。这些馆堂搜集并展示红色文物的同时,也在对这些流散各地的文物进行保护。但目前来看,博物馆主要是以政府为主,民间博物馆尚未成为“后起之秀”。尽管四川有著名的建川博物馆聚落,但笔者在现场参观后发现,这个博物馆群虽然内容繁多,以民间办馆而言,可谓全国之冠。但在“红色年代系列”主题馆中,所谓的“红色”馆藏却仅限于建国后特别是“文革”期间的物品,如毛主席纪念章、语录之类的,可见该馆对于“红色”物品的理解过于偏狭。据笔者所知,在四川,红色主题的民间博物馆尚未建立。本文以为,要保护现存红色文化资源并提升其自身价值,可以采取民间与官方共举的方式,如鼓励民间办馆、高校建立红色文化陈列室或者文化馆等,即以政府为主(如建立相关表彰机制)、鼓励社会团体、学校、企业及个人等积极参与,即发挥各方力量参与,保护与开发并举,“请进来”与“走出去”相结合才是保护红色文化资源的必经之路。

四是进一步加大红色文化资源保护力度,将其纳入党政干部考核体系。在保护红色文化资源的主体方面,地方党委、政府始终起着关键作用,其他途径只能作为补充。要加大对红色文化资源的保护力度,必须增强地方党政干部的责任主体意识,坚持“属地管辖”的原则,才能避免地方政府在保护红色文化资源中的管理缺位现象。本文认为,在干部考核评价机制中,应该考虑区域差异,在注重考核区域经济发展的同时应强调川东北地区红色文化资源的保护举措及其成效,使“红色文化保护”成为该区域党政干部考核的重要内容。这样可以有效地激发地方政府的工作积极性,最大限度地发挥其政府职能,从而为红色文化资源的保护奠定制度保障。红色文化资源在珍贵之处在于它的不可再生性,对此可借鉴前人保存类似资源的“制度约定”方式。据悉,剑阁著名的“翠云廊(张飞柏)”数百年能保存完好,实得力于明清历朝地方官职务交接时,实行了

清点移交的制度。这种明确责任主体的保护制度亦能有效地发挥地方对于红色资源保护的积极性。

五是进一步凝练红色文化资源,彰显其时代先进文化特质。川东北尽管分布着为数可观的红色资源,也呈集聚化的形态存在。但从微观上讲,这些资源则相对分散,从镌刻于悬崖峭壁的石刻标语到流传于民间的红色故事歌谣,内容则十分丰富。这些红色文化资源颇具特色,目前有人讲川东北地区红色资源简要归纳为红色资源“五个一”,即:红色第一联(“斧头劈开新世界,镰刀割断旧乾坤”,现存中国军事历史博物馆)、红色第一缸(红33军打制,高1.2米,长约2.6米,现存万源战史博物馆)、红色第一刻(“赤化全川”石刻标语,现存通江县红云崖)、红色第一校(王维舟在宣汉创办的宏文工农学校)、红色第一陵(通江王坪红军陵园)。这“五个一”较为形象地概括了川东北地区红色资源的价值,凸显其自身文化特点。此外,反映川东北红色文化的一些影视戏剧作品如《红色记忆:1933》、大型红色歌谣与音乐史诗《巴山魂》等也正是川东北红色文化资源中升华提炼的代表作品。由此而言,在红色文化资源的价值提升过程中,应发挥各方力量,政府部门、高校乃至川东北官方(民间)红色文化研究团体集体协作,形成合力,并采取歌舞、影视创作以及其他新兴媒介展开宣传,对于宣传、保存乃至开发红色文化资源,可收事半功倍之效。

六是将红色旅游与文化产业链的构建有机结合。近年来,红色旅游方兴未艾,因为它除了“向中国农村发展滞后的极贫困地区注入经济活力”外,强化游客的国家观念也是其重要内容。^[26]发展红色旅游也成为中央与地方政府拉动经济增长、创新社会管理、培养爱国主义情怀乃至培养感恩情怀的基本共识。近年来,为了深入开发红色旅游资源,相关职能部门还设计了多条川东北红色旅游线路。达州市及附近的著名红色旅游景点有神剑园红色文化陈列馆(张爱萍故居)、苍溪红军渡、万源保卫战纪念馆、巴中将帅碑林及通江红四方面军指挥部遗址以及朱德、邓小平和刘伯承故居等。川东北有着极为丰富的红色资源,并在分布上存在资源积聚的趋向,也有尚待深入开发的自然景观(如通江县的诺水河,南江县的光雾山风景区,达州宣汉的百里峡等),更

有延续千年之久的地方文化。因此,对于该地区而言,应注重打造自身的红色文化特色,尤其注意将本地的自然景观、传统节日、习俗与红色旅游结合。以川东北重镇达州市为例,可以尝试将本地红色文化与延续千年之久的巴渠文化等人文及自然景观相融合,构建文化链,打造一条优质精品旅游线路,最终达到提升红色资源自身价值的有效途径。

四、结语

“救国救民”折射了红色文化的重要内容,而在川东北的红色文化中,不怕流血流汗的“大巴山精神”则是其基本内核。对此,曾三次视察川东北巴中市的温家宝总理就对这种“智勇坚定、排难创新、团结奋斗、不胜不休”的精神予以高度赞扬。可见,弘扬这种踏实肯干的红色文化精神是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体系相契合的,建立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体系

是与大力弘扬民族优秀传统文化传统密切相关,它是激发全民族奋发向上的精神力量与纽带。因此,在现阶段,在川东北乃至全国宣扬这种积极的民族精神气质,对于进一步加快文化强国、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具有不容忽视的意义。

在新形势下,川东北地区应主动抓紧予以解决这些问题,打好“红色文化牌”,将其融入文化大发展大繁荣的潮流之中,并综合运用传统与现代的传媒手段,加大整合力度,推出创新文化品牌,在区域竞争中做到“人无我有、人有我优、人优我特”,抓紧落实《2011-2015年全国红色旅游发展规划纲要》中的相关精神及举措,增添措施,提炼特色,培育品牌,形成优势,以高度的文化自觉与自信加快推进川东北红色资源保护与开发力度,努力推进红色文化在社会事业建设中的发展进程。

【参考文献】

- [1] 中国共产党第十七届中央委员会第六次全体会议公报[EB]. http://news.xinhuanet.com/politics/2011-10/18/c_111105580.htm, 新华网, 2011-10-18.
- [2] 蔡东洲等. 从川陕苏区红军石刻看劳动者解放蓝图[J]. 中共党史研究, 2010, (11).
- [3] [4] [6] [8] [23] 孙和平. 四川红色文化资源开发与利用研究[M]. 四川大学出版社, 2010. 68, 73, 72, 73, 168.
- [5] 四川省博物院主编. 西行壮歌——川陕革命根据地斗争史[M]. 四川教育出版社, 2011. 301-302.
- [7] 达州市委党史研究室编. 达州爱国主义教育基地革命遗址简介[Z]. 内部编印, 2009. 174.
- [9] 达州市通川区党史研究室主编. 川陕苏区红管家[Z], 2011. 50-55.
- [10] 韩承鹏. 标语与口号: 一种动员模式的考察[D]. 复旦大学博士论文, 2007. 33-35.
- [11] 宋小武. 历史在呐喊: 谈古论今话达州[M]. 四川师范大学电子出版社, 2011. 3.
- [12] 常璩. 华阳国志卷一·巴志[M]. 齐鲁书社, 2010. 2, 12.
- [13] 李万斌主编. 红色巴山——大学生红色资源教育读本[Z]. 四川文理学院内部印行, 2011. 8.
- [14] 王维舟. 我的回忆. 中共党史资料(第1辑)[M]. 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 1982. 89.
- [15] 吴玉章. 吴玉章回忆录[M]. 中国青年出版社, 1978. 119, 121.
- [16] 黎余. 《四川省重庆共产主义组织报告》的文本价值[J]. 重庆社会科学, 2011, (9).
- [17] 赵开宗. 中国共产党在达县的地下斗争[Z]. 达县文史资料选辑(第1辑), 1989. 9.
- [18] 中共四川省委、少共四川省委联合通知(1932年10月20日)[Z]. 中央档案馆等编. 四川革命历史文件汇集(1932-1933). 甲6. 1989. 126.
- [19] 川康特委报告书——一九三七至一九四〇年七月(1940年8月20日)[Z], 中央档案馆等编. 四川革命历史文件汇集(1940-1947). 甲12. 1989. 281-283.
- [20] [21] 周开庆. 四川与对日抗战·记达县智识青年从军[M]. 台湾: 商务印书馆, 1971. 246, 252.
- [22] 《新华日报》社论·感谢四川人民[N]. 1945-10-8.
- [24] 柯文. 历史三调: 作为事件、经历和神话的义和团[M]. 江苏人民出版社, 2000. 48.
- [25] 中央访问团办公室(原通南巴先遣工作组)第三次工作报告(1951年)[Z]. 达州市档案馆藏档案. 档案号: 19-1-17.
- [26] 裴宜理, 余婉卉译. 重拾中国革命[J]. 清华大学学报, 2011, (5).

(责任编辑 翟 琨)